

何乃英自选集

励耘文库
张健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何乃其自选集

100



何乃英自选集



励耘文库
张健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乃英自选集/何乃英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 1

(励耘文库/张健主编)

ISBN 978 - 7 - 5329 - 2623 - 7

I. 何… II. 何… III. 文学研究 - 东方国家 - 文集 IV. I30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56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6.25 插页/5 千字/342

定 价 24.00 元

总 序

木铎金声,中文百年。早在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创建之始,“国文”便被列为学科建制的首要门类。1908年,师范馆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延聘的教师多为晚清著名的经学大师。1912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国文部和国文专修科。1923年,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改国文学部为国文系,并增设了国文研究科。及至1931年,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之后,又建立了文学院,下设国文、外文、历史三系。

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北师大中文学科广揽英才,一时风云际会,鸿儒咸集,不仅成为全国中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核心之一,也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学术思想重镇的行列。

大学乃大师之谓。百年以降,不胜枚举的大家名师荟萃北师大中文学科,杏坛执鞭、弘文励教。昔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诸先贤会通开新,彪炳史册;今有郭预衡、聂石樵等一批学高身正、享誉学界的后继者笃信精勤,骞翮远翥。这些上下求索的前辈学人,不仅用智慧与辛劳、学识与著述,也用他们的人格与情操,共同铸造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百年辉煌。

学术当为大学的“立身之本”。北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常葆生机,与其自觉的学术追求不无关系。上世纪30年代,北师大成立国学研究所,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先生就曾中肯地告诫道:大学者,具有创造力之学府也,学术实乃师大之生命线;倘若学术不兴,则师大终将不能成其为“大”。

近现代时期的北师大,其学子多出寒门。生活上清贫朴素,学业上质朴自励,刻苦攻读、勤奋治学、务实严谨,蔚成风气。北师大过去曾有四字校训,曰:“诚”、“敬”、“勤”、“朴”。诚笃力行谓之诚,敬业乐群谓之敬,勤勉奋发谓之勤,实事求是谓之朴,精辟概括了北师大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气。而其中,“诚”、“朴”二字,更是百年师大中文学科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

笃实求真而不务虚华,质朴勤勉而锐意进取;朴学与创新兼容,学术与思想共济;既捍卫学术家园,又保持现实关怀;既恪守育才与“树人”之宗旨,又积极担当中华文化建设之大任。百多年来,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厄,无论历经怎样的变迁,北师大中文学科以“诚朴”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始终不曾断绝,薪尽火传般代代相承至今。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人们从生存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大学在迎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精神追求有可能被物质欲望所“悬置”的社会文化语境,失去轰动效应的中文学科,不得不面临一连串严峻的话题——中文学科的发展,如何面向当今的时代?与时俱进的革新诉求,如何不被浮躁、功利的世风所裹挟?“诚朴”的学术追求与引领社会文化的重任,如何在喧嚣中传承、坚守?

有鉴于此,北师大文学院组织出版了《励耘文库》这套自选集系列丛书。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视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前辈学人们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回答。丛书作者均为本院成果斐然、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这些现已离退休的前辈学人孜孜矻矻、忘我耕耘,用数十年如一日的清苦与执著诠释着“诚朴”之精义,为北师大中文学科的发展倾注了

毕生的心血。丛书所收录的论文,均系作者自选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写作于不同时期、关注不同论题的学术文字,不仅是对作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欣然回顾,也以浓缩的方式集萃了作者精深的学术思考和卓著的学术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篇篇浸透着学识、睿智、思想与操守的文章,负载着传承百年师大优良传统的使命,见证了当代学者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情怀。

这套丛书建构了一方精神守望者的家园。在这里,一群甘于寂寞的思想者,用执著与静思来面对飞逝的岁月和骤变的时代。他们身处喧哗之中,追求的却是潜心向学之中心灵的沉静。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和地位,但他们却享受到了精神的富足。作为百年师大中文学科悠久学术传统的又一批“代言者”,他们以其传承和光大中国文化的热望,以其诚信质朴、不懈求索的精神,为后学者树立了治学与为人的楷模。

先师鲁迅尝言:“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在文明传承和学术进步的链条中,这套丛书的著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是为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张健

2006年7月7日

自序

这本书是我的东方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东方文学研究论文,下卷是川端康成研究论文。

我的东方文学研究

我是1958年7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提起195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新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和“大跃进”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在学校里还有“教育大革命”运动。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教育大革命”运动呢?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又称亚非文学,即亚洲和非洲文学)就是在这个运动里诞生的。在此之前,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只讲西方文学(又称欧美文学,即欧洲和美洲文学)。在教育大革命中,人们认为,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于是,系里组织一部分前苏联文学进修班、研究班和本科毕业班的同学(包括我在内)着手摸索东方文学,一面搜集参考资料,一面编写讲义。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竟然突击编出了一本《东方文学参考资料》,这本书第二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七卷本《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之一。它大概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这类性质的书籍。《东方文学讲义》其实也突击编写出来了,可是由于觉得没有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所以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

要问我为什么参加东方文学编写组的工作,自己当时的想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参加这个编写组的人比较少(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在本科毕业班中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参加,其他的人都是前苏联文学

进修班和研究班的,而他们毕业后又全部离开北京师大了),我想去试试。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可是,不料这一下子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因为,到7月毕业时,我被留在学校中文系,并被分配在外国文学教研室,任务就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干这个专业的,因为这个专业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师指导。但是,我必须“服从分配”(那时的人几乎都是服从组织分配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那么,我到什么地方去求援呢?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那里可以说是中国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地。于是,在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我便经常到北大去取经,听他们的课,要他们的讲义,可谓获益匪浅。季羨林、金克木、刘振瀛、颜保、韦旭升、刘安武和张鸿年(我跟张鸿年是后来认识的)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看过他们的讲义,读过他们的著作,请他们解答过问题。我深知,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自己是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的。再一个是和其他兄弟院校中文系的同行联合作战。当时比较积极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高等院校主要集中在北方,特别是东北和华北地区。我参加过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共同编写东方文学教材的工作,这份教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写好,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未能出版,并且后来一直未能面世。尽管如此,我们互相取长补短,逐渐摸索出一条在中文系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的路子来。因此,我也应当感谢这些

志同道合的同行们。

虽然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始终处在摸索阶段。究竟怎样才能闯出一条道路呢?我还是不断地徘徊于歧路。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一会儿想学好日语,于是去麻烦陈秋帆先生;一会儿又想学好英语,于是又去麻烦杨敏如先生。其结果是,两方面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说老实话,所谓“预期的目的”本身,也是模糊不清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停止了,外国文学研究也停止了(因为差不多所有的外国文学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现在说来有点可笑,记得当时的新华书店里只卖一种东方文学的书,那就是《小林多喜二选集》,大约认为只有小林多喜二不算是“封、资、修”作家,只有他的作品不算是“封、资、修”作品吧),我的东方文学研究当然也就不能不停止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除了参加运动以外,还“客串”评过《水浒》,讲过毛泽东诗词和鲁迅作品,就是没有接触过东方文学。“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不想再回到东方文学上来,而是想去研究中国文学,觉得研究中国文学得心应手,既没有语言障碍,也不愁缺乏资料。但是,我这时不得不又一次“服从分配”,不得不重新回到老本行——东方文学上来。

这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了,我已经越过了四十岁,越过了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我想,我再也不能徘徊下去,我必须下决心学好日语,认真研究东方文学,走出自己的专业道路。幸运的是,在这时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出台,20世纪80年代初,我终于踏上了东瀛留学的道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苦读了两年书,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上面。

现在说起来有点可笑,有些年轻人也许根本不会相信,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是助教,而且没有发表过一篇正经的有关东方文学的学术论文(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无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学术刊物很少,发表论文很不容易)。记得1966年初的时候,我好不容易写成一篇论文,题为《论〈沙恭达罗〉的主题思想及其意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也许该编辑部准备采用,可是同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报停止出版,我的稿子也被退了回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将这篇论文投到创刊不算很久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总算在1979年第4期上刊载出来。这就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东方文学论文。

因此种种,我虽然说是从一毕业就从事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可是真正安下心来进行这项工作,其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十多年里,我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学,二是科研。

从教学方面来说,我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东方文学课,给函授生、电大生和自学高考生上东方文学课。我自以为在教学上还算是认真的,讲课还算是清楚明白的,对学生的要求也还算是严格的,一般学生也认为还算可以,但也有失败的地方。比如有的学生说怕我。不仅有本科生、函授生和自学高考生这样说我,甚至我自己带的研究生也有这样的反映。这使我很吃惊。可笑的是,我直到前不久才明白自己有这样一个严重的缺点(当然严格要求不能算是缺点,但让人害怕就不能不算是缺点了)。我很想改正这个缺点,可惜自己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就讲课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改过的机会了。

从科研方面来说,我也很忙活了一阵子,迄今为止已经发表了若干

文章,出版了若干书籍。就数量而言,跟我的同龄人比较起来也许不算太少。不过,我丝毫没有满足的感觉,我承认我的文章不仅水平不高,而且存在不少的缺点甚至错误。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从总体上说,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初创阶段开始的。当时,我们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料十分缺乏,研究水平相当低下,研究条件也很差。就研究条件来说,比如发表东方文学文章的刊物很少,出版东方文学书籍的机会更是少得可怜。尤其不利的是,我们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还不能不经常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极左思想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在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片面强调政治挂帅,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片面强调思想性而轻视艺术性;而在东方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则除了这些方面以外,还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把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等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东方文学教学研究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步得到解决。

第二个原因是我从事的是东方文学研究,而我并不具备搞好这方面研究的充分条件。先从语言来说,我只懂日语,不懂其他许许多多的东方民族语言,所以我写的东西总有不踏实之感,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以印度诗人泰戈尔而论,因为我很崇敬他,而他又是我们的教学重点,所以我写了两本关于他的书,写了二三十篇关于他的文章,有的人甚至误以为我是泰戈尔研究家,但其实我并不真了解泰戈尔,因为我不

懂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我只能靠别人的译文来理解他,这怎么能深刻呢!就日语来说,我虽然也可以算是懂日语,我看了不少的日文书,也翻译了不少日文书,但我明白我对日语的理解还差得远。我越学日语越觉得日语是无底洞(其实任何外语都是如此)。以川端康成而论,我把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我的确仔细地看过他的日文小说和其他文章,写过和译过关于他的几本书,还写了二三十篇关于他的文章,但说老实话,我对他的理解也是很深入的。因为当我看他的作品时,也许懂得了其中的表面意思,可是却很难更深入地去体会那些内在的、细微的味道。再从资料来说。关于日本以外国家的文学,我只能依靠第二手资料,这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是关于日本文学的资料,我也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图书馆的藏书有限,我自己的藏书也有限。我没有钱去买自己所需要的所有资料,特别是日本新出版的资料。所以,从语言和资料两方面来说,跟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比较起来,我的研究有自己的弱点,并且可以说是致命的弱点。当然,这已是既成事实,我不想表示后悔,更不想埋怨任何人。

第三个原因是我的研究工作往往是在一些主观压力和客观压力的干预下进行的。例如,为了评职称,为了抢时间,为了赶进度,都使我不得不尽快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去,顾不上反复思考,顾不上仔细推敲,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急就章”,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遗憾的是,很多东西一旦发表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为了这个问题,我曾一再感到后悔,但又一再继续地犯同样的新的错误。这些也已成了既成事实,不过好在我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制止它发展下去。

那么,我的东方文学研究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概括起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东方文学总体研究。在这方面,我必须广泛搜集和整理东方文学(含东方各国文学)的有关资料,探讨东方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并且逐步构建东方文学历史的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对于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比较起来具有哪些基本特征,东方三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对于东方文学发展的影响,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以及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历史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二是日本文学研究。因为我懂日语,能够直接看日文书,所以在东方各国文学中把日本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而在日本文学中又把近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在作家作品方面,我根据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确定以《万叶集》、紫式部和她的《源氏物语》、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小林多喜二和他的小说、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小说为重点。

三是东方其他国家文学研究。除了日本文学以外,我还必须涉及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学,特别是像印度、阿拉伯、伊朗、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希伯来、尼日利亚和南非等文学成就较高国家的文学。在作家作品方面,如印度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迦梨陀婆和他的《沙恭达罗》、泰戈尔和他的作品、普拉姆昌德和他的小说,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纪伯伦和他的《先知》、迈哈福兹和他的小说,伊朗的菲尔多西和他的《列王纪》、萨迪和他的《蔷薇园》、哈菲兹和他的抒情

诗,朝鲜的《春香传》,越南的阮攸和他的《金云翘传》,印度尼西亚的普拉姆迪亚和他的小说,希伯来的《圣经·旧约》,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和他的作品,南非的戈迪默和她的小说等。

我的川端康成研究

上面已经说过,川端康成(1899—1972)是我近年以来研究的重点作家。我为什么要选择川端康成呢?除了他的名气较大、成就较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觉得川端康成是一位具有鲜明特色的作家,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他的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有特色,在创作方法上有特色,在表现技巧上有特色,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特色。

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生活了七十三岁,其中有五十八年在写作。他的主要成就就是在小说领域,总共写了四百三十多篇小说,其中包括手掌小说(即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散文、随笔、评论、讲演稿、杂文、书信、诗歌、日记和译文等。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充实了日本文学的内容,表现了日本文学的特点,提高了日本文学的地位,扩大了日本文学的影响。

我的川端康成研究主要依据日本新潮社出版的《川端康成全集》和日本各出版社出版的川端康成作品,在研读川端康成的小说和川端康成本人对于这些小说的解释和意见,并参照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表现技巧和艺术风格四个方面进行工作。

从思想内容来说,川端康成的小说是相当复杂的,并且经历了一个